



文化抗战的江西记忆

战地号角家国情

★ 抗战烽火中的“文艺铁军”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毛江凡 谢龙龙

南昌闹市区，两座中西合璧的民国建筑交相辉映。一座是八一起义纪念馆，一座是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。它们见证了南昌城的历史使命。

1937年7月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，双方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抗日武装问题达成共识。新四军的组建由此而来。根据毛泽东“军部第一步设南昌”的指示，1938年1月6日，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原张勋公馆正式对外挂牌办公。这里成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、新四军驻赣办事处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抗日武装力量的指挥中枢，吹响了向抗日前线进发的集结号 and 冲锋号。

从1月6日至4月4日，新四军军部在抓紧组建新四军、指挥部北上的同时，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全民抗战方针，争取和团结各阶层、各党派、各方面人士，在南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。

抗战团体：凝聚群众的力量

抗战时期，大批从全国各地历经艰险赶赴而来的地下工作者、进步人士、左翼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等，汇聚南昌。南昌一度被誉为“南方的延安”。

在南昌期间，新四军军部经常举行公开的报告会和各种座谈会，讲国内外形势、游击战术、抗日救亡和青年思想问题，并教唱抗日歌曲和举行

联欢会。其间，以南昌为中心，青年运动、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蓬勃发展，江西青年服务团、妇声社、南昌市文化界救国会、江西青年战时工作团等大批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

1937年，沪、宁失陷后，大批流亡青年学生汇集南昌。1938年1月，在我党的推动下，近千人的江西青年服务团成立。全团编为10个大队，分赴全省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，为抗日救亡宣传做了大量工作。

为扩大抗战宣传，团结南昌教育和文艺团体共同抗日，江西青年服务团走访了江西省音乐教育委员会、民众教育馆、新四军战地服务团、话剧团等团体，建议组织成立南昌抗战歌咏协会，把南昌团结抗战的气氛活跃起来。这个建议得到各团体的支持。2月26日，南昌抗战歌咏协会在湖滨公园（今八一公园）成立，现场8000人合唱抗日歌曲，歌声震荡南昌城。

江西省抗敌后援会作为全省最大的抗战团体，在全省83县及省会工商、教育、妇女、新闻记者等团体成立了分会；战地青年服务团，青年救国会和妇声社等抗日爱国团体，协助和指挥全省各地深入开展抗日爱国斗争。一系列抗日救亡宣传与组织工作，大大提高了群众思想觉悟，激发了人民爱国热情。

抗战书店：照亮思想的灯塔

1938年1月6日，小寒。南昌阴云密布，寒风凛冽。红砖小楼内，几名青年男子在热烈交谈，其他人忙碌地布置房间。这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成立时的景象，东南分局的重要工作就是开

展文化抗战。

白色封面上密密麻麻的血滴洒开，顶部书写“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知识”几个繁体大字。这本8万字的书籍被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珍藏。作者黄道是江西横峰县人，曾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、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。黄道针对党内有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倾向，写下了这本书，并由江西大众文化社以解放社名义出版。时任江西大众文化社的社长漆裕元，是黄道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。漆裕元曾被逮捕入狱。出狱后，他在东南分局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帮助和支持下，于1938年3月在南昌成立了江西大众文化社，并担任社长。

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珍藏的另一本书《战时读本》，在当时也备受欢迎。该书由生活书店发行，讲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历史。生活书店是当时重要的进步文化机构。1932年7月，在邹韬奋主编的《生活》周刊社基础上成立了“生活出版合作社”，对外称生活书店。

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和南昌各进步团体的帮助下，生活书店南昌分店于1938年初正式开张营业，公开发行了政治、经济、哲学等各类著作1000多种，《战时读本》《大众读物》发行量达到500多万册，风靡一时。根据黄道的指示，书店以秘密方式供给共产主义理论等书籍，如《共产党宣言》《论持久战》《西行漫记》等。

为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，新四军创办或推动创办了一大批进步书店，如战时文艺社、战时书报供应所等。出版发行进步书刊《青年团结》《妇声》《江西妇女》《中国农村战时特刊》《抗战日

报》《抗战评论》《江西青年》《乡村与抗战》《抗战宣传手册》等。这些书刊对唤醒民众、鼓舞斗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

抗战文艺：唤醒民众的号角

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”
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……”

1938年2月26日，春寒料峭，南昌街头火热，人们慷慨激昂，匆匆赶往湖滨公园。音乐家何士德正指挥3000名民众举行抗日歌咏大合唱，大家引吭高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中国站起来》《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》等歌曲。

蒙国难，群愤起。雄壮的歌声，引起广大市民的强烈共鸣，会场周围的5000多名群众也随之歌唱起来，蔚为壮观。会后，大家来到中山路游行。何士德站在一辆卡车上挥动着指挥棒，指挥8000人歌咏大游行。人们高呼：“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！”歌声与口号声此起彼伏。马路两旁人山人海。

街头即战场。新四军以艺术为枪炮，三个月内在南昌创造了抗战宣传奇迹。当时的南昌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大刀进行曲》《保卫大江西》等歌声。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深入茶馆演出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《抓奸》等，绘画组在南昌大街上绘制了巨幅抗日宣传画，揭露敌寇的兽行。吴晓邦的现代舞蹈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在南昌连演5场，舞步踏出民族不屈之魂。南昌大光明剧院内，万人义演大会成为抗战文艺力量的一次大检阅。

1938年4月4日，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开往前线开辟日寇，南昌市民赶来欢送。他们依依惜别，高唱抗战歌曲，高呼抗战口号。

新四军在南昌领导开展的抗日文化救亡运动，唤醒了人民，教育了群众，起到了鼓舞民族斗志、凝聚军心的作用，极大地推动了南昌以及江西的抗日热潮，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，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★ 一颗文化火种的迁徙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颖

一方屋檐

1938年2月，浙大师生已从浙江建德分三批迁至吉安。起先，学校计划迁至白鹭洲上的吉安中学，但刚到不久，白鹭洲便遭到日军轰炸。2月3日至9日，上学期学业考试结束后，浙大放假一周，准备迁往吉安以南80里的泰和乡间。

“日军投弹数十枚”“敌机在嘉兴、嘉善投弹至三百枚之多”“军人扣车太多”“疾病肆虐”“日军轰炸吉安飞机场，投弹卅余枚”……浙大师生沿途所历，是这样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。

而泰和为这群颠沛流离的师生提供了一方弦歌不辍的平静屋檐。泰和，因“地产嘉禾，和气所生”的特质而得名。曾经接纳了日军轰炸，国立中正医学院、国立幼稚师范学校等各大院校和数以万计的“走日本”“走饥荒”的潮汕难民的泰和，再次以广博的胸襟接纳了浙大。“所看见的是青山绿水，所听见的是鸟语虫声，到处所遇到的是村妇车水与农夫插秧，毫不觉得是战时景象。”（李聚非《浙江大学西迁纪实》）

2月9日，浙江省立图书馆所藏文澜阁本《四库全书》迫近前线，浙大受托转移这批宝贝，至5月1日，经5省，历5000里，浙大将139箱古文化珍宝，运抵安全的祖国腹地。

2月18日，有空袭警报。浙江大学全体师生到达泰和。一年级住大原书院，二、三、四年级住萧宅，并决定收借读生50名。

3月8日，竺可桢致函当时的教育部，报告浙大学生426人，教职员179人已于2月24日在泰和开课。2000箱图书、仪器也全部运达。

6月26日，浙大在新村萧氏宗祠举行西迁后首届（总第11届）毕业典礼。竺可桢寄语各毕业生：“我希望诸位到社会做事，能够把这自强不息、奋发有为的精神，传播于各村乡、各城市、各机关。”

……
在泰和，古庐陵“序塾相望，弦诵相闻”的学风之盛，让浙大师生们感到似春风归来——

浙大制度逐步完善。在这里，浙大孕育了沿用至今的校歌和校训，将在国内率先推行的“本科导师制”全面实行开来。

浙大守望着文化传统。国学大师马一浮授国课，引端即曰：“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，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，信吾国学术之定可昌明。”

浙大呼吁着树我邦国。钱基博复刊《国命旬刊》，呼吁凝聚精神力量抵御外侮，撰稿人几乎清一色的是大学文史教授，他们自觉担当起建设精神国防线的责任，形

成当时时事刊物中罕见的文史大家云集的现象。

而遗憾的是，竺可桢的夫人张侠魂女士、次子竺衡，皆因病疾，永远地留在了泰和……

投我以桃，报之以李

随着战事西进，日军进犯九江、鄱阳、赣中告急。浙大师生在泰和上田村生活了8个月。之后，迫于战事，于1938年10月8日离开。

在这里，浙大师生组织兴筑防水堤，东起泰和县城，西至梁家村，全长15公里。当年赣江难得平静，1939年7月间，泰和再次遭遇罕见洪水，这道浙大师生会同800工人共同修筑的生命堤坝，护卫了上田及周边，百姓颂之为“浙江大学堤”。

在这里，他们移垦荒田救济难民，共计垦荒92290亩，自行投奔而来的垦民达140人；

在这里，他们兴办澄江学校，推广儿童健康教育，设立平民夜校教授珠算、习字；在县城内排演抗日话剧《卢沟桥》《东北之一角》等，并积极分发抗战传单；学生话剧团还携《中华民族的子孙》等剧举行公演，所得款项用于救助伤兵……

时至今日，拨开已隐匿在山林杂木中几不可见的小路，张侠魂女士和竺衡的墓地依然静立在泰和松山的草木间；浙大的求是精神，仍在泰和各个领域的对口援建和捐赠项目中，散发着温暖而赤诚的光与热。

一代代的浙大人始终记得，1938年，那束来自泰和大地温暖的阳光。红土地上的人民也始终记得，80余年前，山河破碎时，一颗种子为气节和求知而开启的这场傲骨铮铮的迁徙。

★ 国宝南迁背后的江西贡献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谢龙龙 毛江凡

《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》中记载，清代从江西景德镇进贡的瓷器，皆以木桶装运，装桶时把10个碗一个叠起来成一串，用稻草把碗扎紧，放在桶里，每束之间，再用谷壳隔开，塞紧至毫不松动，因而运到北京的瓷器虽千里跋涉，但没有一个破碎的。曾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史学家马衡，也在回忆文章中称：故宫工作人员借鉴了景德镇瓷器传统包装方法，在市场上买来普通的瓷器碗，用四层包装方法，纸、稻草、棉花、木箱……做试验，确保了不论翻车、进水，损失微乎其微。

参照和借鉴景德镇瓷器传统包装方法，他们在装箱时，先在箱底垫上一层稻草（棉花）。在靠近箱板处都塞满棉花，然后再覆上一层稻草（棉花），放上一层瓷器，这样装进两或三层后，再盖上稻草（棉花），最后把木箱盖好钉牢，使箱子成为一个整体，其间无任何空隙。在后

来的国宝南迁万里征途中，景德镇瓷器传统包装方法得到了完美验证。

被誉为“中华第一古物”石鼓的转运便采用了景德镇瓷器传统包装方法。先把薄软的高丽纸浸湿塞进石鼓裂缝，用棉花包裹四五层，再在外面包上三四层棉被，用粗麻绳捆扎紧，石鼓装入定制的水箱后塞紧钉牢，外面再用稻草覆盖，最后用钢条绑孔封死。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，故宫文物集中在重庆，全部由水路东归南京，由于石鼓重量大，水运危险，便由公路转运。其间，道路崎岖，运输车多次发生事故，石鼓却安然无恙。进入江西境内，石鼓经上栗、上高，抵南昌，运九江，再由水路运往南京。据那志良回忆，江西境内因遭受日军炮火和屠杀，人烟稀少，道路难行。此次行程走了近两个月，而在江西境内就逗留了一个月。

1.3万多箱文物，来回两万公里路程，在当时的运输

和存放条件下，不仅要面临日军、土匪的炮火和劫掠，还要提防潮湿、白蚁和鼠患等。即便这样，在14年里，堪称旷世传奇的故宫文物南迁与东归，几乎无一损毁、遗失，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华民族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提振了民众的精神，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，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。景德镇瓷器传统包装方法在这次行动中立下了赫赫“战功”。

景德镇瓷器传统包装法历史悠久。赵水涛说，景德镇瓷器闻名世界，纵观景德镇陶瓷发展史，陶瓷包装历来都是陶瓷产业的一个重要环节。景德镇古代陆上交通不发达，瓷器的外销运输多是采用水运的方式，以赣江、鄱阳湖水系为枢纽，运出江西，与全国各地水路相接，并进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。正是古老又神奇的陶瓷稻草包装技艺，精心呵护了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。

陶瓷稻草包装技艺从宋元明初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末，历经600多年的发展，为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、艺术交流、商业贸易、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今天，陶瓷稻草包装技艺就像那些故宫文物一样，它们的价值不只是放在博物馆里供人欣赏，而是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，连接着我们民族的过去与未来。

1937年12月13日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日记里记下了两件事。南京失守，赴泰和上田村看萧家屋。屋大，亦空，交通便利，出产丰富，“颇适宜于大学暂避也”。

彼时的偌大中国，已经难以安放一张安静的书桌。2025年8月19日，记者在泰和县浙大西迁纪念馆，见到一张一条腿残缺的旧书桌静伫在大厅正中，无声标注起这段动人故事的艰难起点。

日本侵略者獠牙森森，有亡我中华的野心，也有毁灭我文明火种的妄想。自1937年7月起，全国众多高校遭受轰炸……铜驼荆棘中，竺可桢率领近千名浙大师生及部分家属，携着2000多箱图书仪器，开始了历时2年余、行程2600多公里、流亡办学7年的征程。

书生们在战火中亲历家国破碎之痛，淬炼着自身的坚毅品格，也自此奠定了“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”的求是精神。

求是，是浙大沿用至今的校训。竺可桢说：“求是精神首先是科学精神，但同时又是牺牲精神、奋斗精神、革命精神。”

泰和办学期间，在浙大任教的教师有11人后来成为院士；当时在浙大求学的有8人后来成为院士，其中包括“两弹一星”元勋、理论物理学家程开甲。

这是一颗文化火种的迁徙，也是一支文军的长征。

西迁前，浙大有3个学院、70名教授和副教授、512名学生。西迁后，在竺可桢的主持下，发展为7个学院、201名教授和副教授、2171名学生的规模，跻身国内外著名大学之列，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称为“东方剑桥”。后来者每每回望浙大西迁的这段过往，与红军长征前半程路线多有重合，这的确是“一支文军的长征”！

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150万件文物被掠夺，焚毁者不计其数；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珍贵文物遭到空前浩劫……惨痛的经历让人痛心。1931年9月18日，九一八事变爆发，东北沦陷，华北告急，平津震惊，故宫国宝危在旦夕，文物迁移刻不容缓。1933年2月5日深夜开始，1.3万余箱文物先后分5批运往上海，后转移至南京储存。

1937年，淞沪会战爆发，南京岌岌可危，故宫文物再次疏散，分南、中、北路水陆并进向西南大后方疏散，最终转移至四川存放。故宫文物不仅在迁移往返时途经江西，文物的包装也借鉴采用了景德镇的一项非遗技艺。

南迁途中，故宫文物要跋山涉水，防风沐雨，还要面临炮火轰炸、匪徒劫掠，如何确保国宝完整无损，尤其是许多国宝级陶瓷等易碎品的保护，成为文物南迁途中安全重中之重。据景德镇陶瓷包装历史博物馆馆长赵水涛考证，在国宝南迁中，景德镇瓷器传统包装方法，为保护故宫国宝作出了特殊贡献。

起初，故宫工作人员无人对文物装箱有经验，他们只得“师法前人”，从北京故宫的库房中，找出清代从景德镇运到宫中，一直原封未动的瓷器箱子打开来看。曾参与国宝南迁的原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那志良，在